

生活故事

每逢十五号

■陈茂生文

如今时兴“断舍离”。在旧书报中意外翻出一团纸,定睛一看竟是当年的“工资条”。

当年进厂要办“学徒学习班”,大小领导到场讲话“做规矩”。而台下早就心猿意马的众人听到“每月15号发工资”时挤眉弄眼偷乐的场面还记忆犹新。上海话把“日”称作“号”。某年15号,拿着人生第一笔工资18.84元,奶奶和母亲欣慰的笑容仍在眼前,所以每逢此日都心情愉悦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上海开埠后工商业兴起。现金付工资即为天经地义,并持续百余年。在工厂时,每月10号左右车间管理员要为全车间数百人“做工资表”。表上每

个数字都关系切身利益,不可疏忽。好在除了病事假、中夜班津贴,每人工资基本“步调一致”,只要认真便可应对。

15号一早从财务科领来现金,清点无误后逐一分发,并与“工资条”一起塞入信封。此项工作须在中午一点前完成。届时,上中班的职工已在门口排队,稍后早班职工要揣着工资回家。

那时工厂工作几乎都靠体力。职工做最重的活赚最本分的钱,虽然不多但够温饱,只要发放有据,谁不希望多几个“15号”呢?就像如今招聘启事中“十三薪”“十四薪”……那样。记得,当时有人还将信封往桌上一倒“一五一十……”数清楚,连分币也要“啵啵”地碰个响。晚上9时半,夜班职工领工资也如此这般的操作。

如今回想颇有感触:住高处说是“全心全意服务一线职工”,说实惠些就是都靠工资“开火仓”容不得半点玩笑。而老职工的话更形象:钞票要在手里“过一过”,否则“心里没底、做生活没劲”。所以工厂的15号,总是既快乐又庄重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后,有了人生第一张银行卡,初始密码“八个1”。工资每到15号“打卡里”。当然也会发一张“工资条”,有关数字只要不说就没人知道。也有老师傅为记不住密码而嘟囔、为猜不到别人卡里有啥“花头”而郁闷。有家庭的中年男职工更喜忧参半,因为“上交工资卡”挤压了“上交工资”的最后一点模糊空间,也不再有人并肩数钞票的“盛况”。

如今网络无所不在,工资瞬时到账、扫码支付潇洒。想起百余年间“现金发工资”到“打卡里”、纸质“工资条”逐渐被冷淡的过程,恍如隔世。只是迄今每逢15号,嘴角仍不自觉荡起浅浅微笑。



紫寿带(世纪公园) ■许超森

意犹未尽

两个祖母

■童伟忠文

我有两个祖母,一个在浙江余姚老家,一个在上海石库门里。

少不更事,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比别人多了一位祖母。我好奇地问二爷爷(爷爷的弟弟),他疼爱地摸着我的头告诉我,余姚的祖母和你有血缘关系,她的大弟弟解放前在上海天潼路小菜场卖水产,因为穷,50多岁还没成家。这时,有热心人将在十六铺码头卖粽子的小脚女人撮合给他。两人成婚后没有生育,你余姚的祖母便把5岁的小儿子过继给他。这个小儿子就是你父亲。你父亲从此有了亲母和养母,你也就有了亲祖母和养祖母。

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。记得6岁那年,亲祖母对养祖母说,亲孙子应回余姚,随她一起生活。养祖母则表示,孙子生在上海,由她一手带大,舍不得放手。这场孙子的之争,最终胜出的是亲祖母。我的户口由上海迁到了余姚乡下。我从老北站乘上离沪的火车那天,养祖母在月台上追着喷着蒸汽的火车,一头银发被风吹乱,眼眶红红的,伤心地喊着我的名字,叫我别忘了她。这一幕刻在了我幼小心灵的

深处。

亲祖母对我这个亲孙子呵护有加。

我的童年乡村生活丰富多彩。盛夏,邀同伴去流经村口的姚江游泳,让清澈的江水洗去暑热;夏夜,跟随暂居我家的养蜂大叔用自制的竹钳捉黄鳝,收获愉悦;冬天,与借住在我家的阿兴叔叔合作堆雪人,亲祖母倚在窗前呵呵地乐。最难忘的是清明前后,我随亲祖母去屋后翠绿的竹林挖春笋,在她的指点之下,我挥舞着小锄头,兴奋地劳作,一会儿功夫,竹条编的背筐里装满了褐色笋壳上沾满露水的春笋,一种劳有所获的成就感让我兴奋不已……

时光如梭,一晃到了上学读书的年龄。看着邻家的孩子兴高采烈地做着入学准备,养祖母倍感焦虑和寂寞。前厢房的宝民叔叔对她说:“阿婆,你可以申请将孙子的户口重新迁回来,这样他就能在上海读书了!”

“真的?”“你请居委会开一个书面证明,理由是你已到古稀之年,身边需要有人照顾,孙子本来就出生在上海。再到派出所去盖章确认。你拿着证明去余姚当地的派出所,提出孙子户口回迁申请。阿婆,你去试试吧!”

这一招果然奏效。告别余姚老家这天,亲祖母牵着我的小手依依难舍,但养祖母的一句“小囡在大城市读书,将来肯定比在乡下有出息”,让

她只能忍痛割爱。

我随养祖母回沪,就读于浙江北路第二小学。那时,家里经济条件差,仅靠每月支内到河南洛阳拖拉机厂工作的父亲区区15元汇款维持。养祖母趁身体尚健,去别人家帮佣,赚点零用钱贴补家用,保证中晚餐有一荤一素一汤。养祖母总是把荤菜往我碗里夹,我问:“依为啥勿吃啊?”她笑咪咪地回答:“阿娘胃口不好,咬不动了。”其实,她是省下一口,让我多增加一点营养。

小学阶段,我作业不多,特别贪玩,休息天家里更是看不到我的身影。每当午饭时间,养祖母迈着一双缠过的小脚,前后弄堂边走边喊:“伟忠啊!回家吃饭啦。”同伴羡慕地说:“我家阿娘从来不叫我回家吃饭的。”“阿娘只有我一个孙子,你家阿娘有三个孙子,顾不过来了!”我这样说着,内心颇有些自豪。

学校放寒暑假,我必定回余姚老家探望年岁已高的亲祖母。见我已到长身体的时候,老人家用自家养的童子鸡清蒸后,一定要看着我全部吃下去。她还叮嘱阿兴去捉鱼摸蟹,丰富我的食物,让我尽快长个。

“哀哀父母,生我劬劳。欲报之德,昊天罔极。”在生活贫困的年代,两位祖母给了我双倍的快乐、叠加的幸福。上世纪七十年代末,我走上了工作岗位,有了尽孝心的能力,两位老人家却先后离世。

岁月悠悠

忆外祖父

■吴毓文

对外祖父的印象,大多是些碎片式的记忆。

我跟外祖父接触并不多,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学龄前,母亲将我托付给常州马杭桥小镇的外祖父。记忆里,乡下有座石拱桥,石板台阶磨得泛起温润的光泽,还有条蜿蜒的长河,每日清晨,总会被轮船靠岸的汽笛声唤醒。

外祖父家门是条长长的青石板路,常有挑着粉丝、豆腐脑的小贩吆喝着走过,我极爱吃粉丝,在乡下曾因贪嘴吃上吐下泻。幼时总见外祖父握着铜质老烟壶抽水烟,他用劲一吸,烟腔里便发出“咕辘辘”的水声,引得我总好奇这声音的由来。有时还吸鼻烟,看他右指沾着胭脂色的粉末往鼻孔里按,古旧男人作派。他还爱喝酒,午睡醒来总要抿两口烧酒,也会笑着让我尝下,塞给我一块小桃酥,吃一口饼在我唇上沾一滴酒,虽辣得我淌眼泪,却觉得格外开心,外祖父是很爱我的。

外祖父很爱结交朋友。清晨,家里的木门“吱呀”一声打开,九点多钟,厅堂长条凳上便坐满了老头老伯,大家闲聊唠嗑。外祖父抽着水烟,笑咪咪地和大家侃大山,看那神情就知道那是外祖父最开心的时光。厅堂右墙边立着一台比我还高的摇面机——那是家里的生计,它帮邻里乡亲摇出宽面、窄面和馄饨皮,赚些零碎的角币。我总爱摩挲大轮子上滑溜的手柄,也看外祖父转动巨大轮子,将面团变成细细的面条。

我对外祖母几乎没印象,听母亲说,外祖母脾气温和,外祖父却性子

急躁,时常对她发脾气,两人像对“冤家”,总难和睦。后来外祖母患胆囊癌离世,仅58岁。母亲带我赶回老家时,做医生的阿姨连打三针强心剂,只为让外祖母能睁眼再见到我们一面。

倔强的外祖父却从未对我发过脾气,还曾笑着说长得俊俏。在乡下的日子,每天都是他帮我梳头,用力将我的头发扎成两条高高的牛角长辫,扯得我头皮生疼,我却不敢作声。他还会用菜刀“吭哧吭哧”地帮我削铅笔,牵着我的手走过石桥,送我去学堂。那时年幼稚小,脑子像没开窍,写的字总是反的,怎么也改不过来。

年迈的外祖父极少离家,仅来过一次上海我家小住。他有严重胃病和十二指肠溃疡,在上海住不惯,又犯病,站在阳台上阵阵呕吐,没几即便回乡下。为了缓解胃痛,他床头总搁着一块长木板,上面摆满零食,以防半夜胃闹腾时随手吃点。母亲每次回乡,也总不忘给他带些爱吃的零嘴。

有次暑假,母亲让我独自回乡下探望外祖父。彼时他已大多躺在床上,我便帮他倒夜壶、涮痰盂。他晚年由乡下的阿姨照料,牙齿掉落后,每日只吃些豆腐和酥神的食物,多年的十二指肠溃疡竟神奇地好了,也无其他慢性病。最后,他在那张躺了几十年的床上平静离世,就像油灯燃尽最后一滴油熄灭了,终年79岁。

一生守着祖屋,平凡倔强的外祖母未曾给我留下太多完整记忆,可祖辈的羁绊连着血缘与乡愁,是刻在心底的印记。忘了他们,便像忘了自己的来处与根脉。他曾牵着我的小手走过石桥,曾往我碗里添菜,曾塞给我配酒的桃酥,还有乡下漂亮的婉琴姐,在后街大伯家深夜抄手抄本的时光,都像记忆海洋里的浪花,永远荡在心底最柔软的地方。

世相百态

差龄生

■邱伟坚文

1977年底恢复高考后的头几年,大学班级里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,同班同学中年龄差距悬殊,差个十来岁绝不稀罕。

以我就读的机械专业班级为例,三个是1966届高中毕业生,均出身于1947年左右,最小的是出生于1960年的应届生,年龄相差了十多岁。课堂上有同学戏称爷叔与侄儿一起在读书,这就是当时所称的差龄生,是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所致,被积压了十多年的中学生集中到一年考试,然后又同一年上学。

应届生聪明伶俐,反应极快,尤其是数理化等基础课程,老师在黑板上推导公式,侄儿辈一点就通,而爷

叔们眉头紧锁许久不得开窍,虚心向侄儿求教,一遍不行就两遍,直到点头称是。

爷叔们学习刻苦,每晚十点教室熄灯才离座的均是他们。第三学期开始上专业技术课,枯燥乏味的专业名词、工艺流程及元件器材等,这回轮到应届生一头雾水了,而凭着在以前工厂积累的实践经验,加上他们的理解力,爷叔们的考试成绩就开始优于应届生。

四十年以后大家聚会,校园读书的激情及劲头,一直是彼此津津乐道的内容,差龄生自然也是一个绕不过的话题,那是那个年代特有的现象,以后再不复存在。

时光荏苒,不管爷叔还是侄子辈,当年的差龄生都已经退休。有不少人还参加了老年大学学习,踏进教室发现差龄生这一现象竟然又再现了,且岁数相差更大。

以我就读的四平老年大学古诗词班为例,最大的年近八十,据老学长说以前还有女儿推轮椅送来的,最

小的则是50出头,前脚办完退休手续后脚就来这里报名注册,年龄差竟然达到了30年之多。

呵呵,此一时彼一时,其内涵自然与上世纪80年代大学内的差龄生不同。印象最深的是徐老先生,他年轻时就支内去了安徽“小三线”当钳工,凭着扎实的文学功底及丰富的阅历,他的格律诗作一直在班级内首屈一指。年逾八十后,他去了养老院,仍不时有佳作发到班级朋友圈,教人不胜唏嘘。

而比徐老年轻20年的女同学惠敏,十一年前退休后从台州来沪,替女儿带孩子,家务之余参加古诗词班学习,她的诗作常常被老师作为范文点评,今年又在市诗词刊物年度评选中获得一等奖。

“老而好学如秉烛之明”,不管是高龄生还是刚退休的新学生,尽管以前各自从事的专业及经历皆不相同,但在退休后都选择了自己喜爱的唐诗宋词,差龄生们在老祖宗留下的瑰丽宝库里徜徉。